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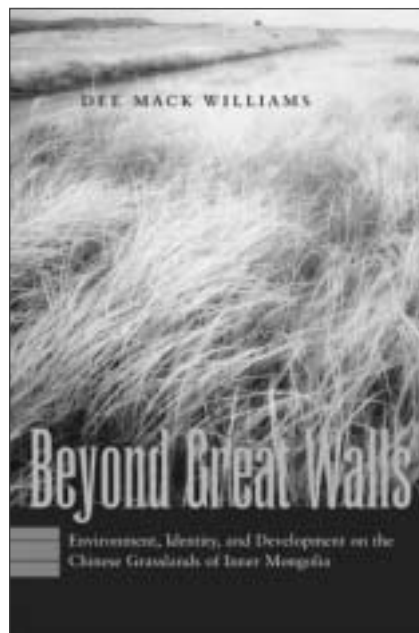
流水，調查研究更是獨闢蹊徑，「勇闖虎穴」，深入實地，與恐怖份子面對面地交流，真正從人之心理中挖掘，不僅讓讀者看到一個真實的恐怖面孔，同時穿透這種面孔，讓人看到了更加恐怖的骷髏——政治、經濟權力與權勢的操作者。如果要從整本書中，找到最讓筆者觸

動的話，應該是開場白中的那句話：宗教恐怖主義，來自內心的疼痛，來自喪失親人的悲憫，來自對養主「不公」的怒吼，也是對養主命定的一種絕望（頁10）。這種疼痛，在徹底絕望之後，這些受害者對這個強權、強勢集團所締造的兇暴世界作出了最後一搏。

揭開話語的面紗

● 張 雯

本書以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翁牛特旗的那什罕蘇木為例，研究1980年代以來的「去集體化」和經濟發展給草原牧區帶來的巨大變遷，以及政府機構、市場經濟、草原科學家、西方知識份子和當地牧民多種主體之間的互動關係。



Dee Mack Williams, *Beyond Great Walls: Environment, Identity, and Development on the Chinese Grasslands of Inner Mongoli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威廉姆斯 (Dee Mack Williams) 2002年出版的《長城之外——中國內蒙古草原的環境、認同和發展》(*Beyond Great Walls: Environment, Identity, and Development on the Chinese Grasslands of Inner Mongolia*，以下簡稱《長城之外》，引用只註頁碼)，是近年來研究內蒙古環境和社會變遷較有影響的一部人類學著作。美國著名人類學家賈科維雅克 (William Jankowiak) 高度評價此書：「這是民族志寫作和中國研究的一部重要作品，體現出作者具有原創性的有力分析和高度說服力的理論主張，將為未來中國和世界的草原研究奠定一個新的基準。」(參見封底評論)

這本書以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翁牛特旗的那什罕蘇木為例，主要研究的是二十世紀80年代以來的「去集體化」和經濟發展給草原牧區

帶來的意想不到的巨大變遷，以及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機構、市場經濟、草原科學家、西方知識份子和當地牧民多種主體之間的互動關係。威廉姆斯曾於1993至1994年參加中美學術機構合作組織的一個關於草原生態系統的科研項目(Global and regional Earth-system [Atmosphere] Monitoring using Satellite and in-situ data, GEMS)，以專家學者的身份在當地的科學考察站中住了一年，因此有機會同時接觸漢族科學家和當地的蒙古族牧民，他所處的位置為其人類學研究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且有趣的觀察點。在本文中，筆者將緊緊抓住威廉姆斯的分析思路和論辯邏輯，為讀者閱讀此書穿針引線。

一 尋找「替罪羊」

首先，威廉姆斯清楚地指出，面對內蒙古當前嚴重的草原環境危機，中國官方話語表現出的傾向是將責任通過「空間」和「時間」兩個維度從自身轉移開。在「空間」的維度上，政府將責任轉移到與北京相距遙遠的當地放牧者的身上。當地的蒙古族牧民在政府官員和學者的描述中往往是無知的、落後的、非理性的和不合作的：他們依賴於傳統的放牧方式，「靠天放牧」，不能掌握先進的放牧技術和知識；他們懶惰，「竟貓冬」（當地的一句諺語，指冬天待在家裏不幹活），思想觀念跟不上新形勢發展的要求；他們經濟上貧困，缺乏環境保護觀念，因而靠掠奪自然資源來謀求生存。

總之，官方輿論認為，環境的惡化與當地低度發展的文化、科技和生產力緊密相連。因此，草原生態的恢復只有在放棄傳統生產方式的前提下才能實現，而且必須採用更為先進的制度安排和科學技術來保護環境和發展經濟。二十世紀80年代以來，政府實施的「草畜承包」制度就被認為是這樣一種科學合理的制度：將草場和牲畜承包到每家每戶，從而使草場的利用和保護功能結合起來，所以能給牧區環境和經濟的發展帶來積極效應。

在「時間」的維度上，政府則將責任轉移到已成為歷史的政體上，如清朝和民國時期的人口遷移和蒙地放墾政策，以及集體化時代的草原開墾運動。威廉姆斯分析道，在毛澤東時代，官方話語往往把「資源掠奪」導致的環境問題與所謂解放前「社會剝削」的政治問題聯繫起來，當地環境的退化與人民群眾的生活苦難都與「三座大山」分不開。因此，毛時代的「戰勝自然」、「人定勝天」表明的不僅是人要從自然獲得解放，而且也是從「封建主義」那裏獲得解放。有意思的是，1978年以後，話語的轉向又將毛澤東時代列入了「替罪羊」的名單，許多學者紛紛指出，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時期無節制地使用草原大大加速了沙漠化的進程。現代性話語於是開始鼓吹以先進的科技來戰勝長期困擾落後地區的古老的沙漠化難題(頁37)。由此看來，每一個時代官方話語的策略似乎都是將責任推卸到前一個時代，大力宣揚當前政策的合理性，如何能帶來新的進步和繁榮云云。

威廉姆斯指出，面對內蒙古當前嚴重的草原環境危機，中國官方話語在「空間」的維度上，將責任轉移到與北京相距遙遠的當地放牧者的身上。在「時間」的維度上，則將責任轉移到已成為歷史的政體上。

儒家社會對北方遊牧地區及其人群一直持敵視態度，用「荒」、「曠」、「蕪」、「野」、「窮」等字眼來形容草原。「開荒」對於農業社會來說是個好詞，因為它將長滿「野草」、沒有被利用的土地開發成了碩果纍纍的良田。

因此，「怪當地」(blame the locals) 和「怪前朝」(blame previous regimes) 就是政府關於草原沙漠化問題做出的解釋。那麼，草原的退化是不是就該由當地牧民和過去的政體來負責呢？威廉姆斯在此書的開頭部分就精心設計了這個問題，而在筆者看來，整本書接下來的內容都是圍繞着這個問題進行一次次的討論和回答。

二 政治經濟和文化解釋

在《長城之外》第三章中，威廉姆斯着手分析有關草原環境和牧民生產生活的宏觀政治經濟現實，對上面的問題進行了一次初步回答。在現代化和全球化力量影響世界各個角落的今天，討論地方事實不可能脫離民族國家的內部治理和資本主義市場。威廉姆斯列舉了許多因素來說明當前的國家政策方針和發展戰略對當地的不利影響，如低投資和行政管理的鬆弛、不穩定和有限的草原租賃期、不利的牧產品價格、不充足的勞動力供應和「異化」、基礎設施的不完善、法律的實施無效等。他認為國家的發展戰略沒有將畜牧業放在一個優先的地位（從近年國家在該領域的投資情況就可以略知一二），從事牧業的邊緣人口因此並不能分享整個國民經濟增長帶來的好處（頁53）。在地方事實與全球資本的聯繫方面，威廉姆斯也分析了日益擴大的貿易出口以及西方組織機構（如聯合國、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等）對當地的直接影響。鑒於宏觀政治經濟

因素與當地現實的緊密聯繫和不可分離，環境退化問題怎麼可能只歸咎於當地的蒙古族牧民呢？

除了政治經濟分析之外，威廉姆斯還反覆強調文化解釋的重要性，他在書中第四章分析和比較了漢族和蒙古族關於環境空間的不同文化假設。漢族農耕社會的傳統觀念是將空間看作分割的和不連續的，空間往往體現着中心與邊緣、文明與野蠻的等級關係。儒家社會對北方遊牧地區及其人群一直持有敵視態度，用「荒」、「曠」、「蕪」、「野」、「窮」等字眼來形容草原。「開荒」對於農業社會來說是個好詞，因為它將長滿「野草」、沒有被利用的土地開發成了碩果纍纍的良田。然而，傳統牧業社會的本質是流動性的，沒有房屋，沒有財產，流動不居的生產方式使蒙古族具有廣闊的空間視野。因此，與漢族分割和精細的空間感相反，蒙古族的空間體驗是不精確的和相對的。他們有「空間解放」的衝動，傾向破壞城牆和各種人造建築，拆除邊界，還空間以遼闊。被漢族視為是一件好事的「開荒」，卻是蒙古族深惡痛絕的，他們認為這是在「破壞土地」。蒙古族傳統上還有共用草場和水源的習慣（卻很少發生矛盾），在生產勞動上相互幫忙的「聯戶」組織等。在作者看來，不同的主體對於環境都有不同的象徵符號系統，而常見的現象就是漢族用自己熟悉的環境空間觀念或西方科學的理性來理解當地蒙古族牧民對環境和土地的感知與知識（頁79）。

就政治、經濟、文化三者的關係而言，應該說，文化之下有冷酷

而深刻的政治經濟邏輯，政治經濟邏輯之上有複雜和多樣的文化涵義。而地方、國家和全球層面上的多種力量對於當地環境現實的「塑造」，也正是三種因素互動的結果。在接下來的整整三章中，作者就以翁牛特旗那什罕蘇木豐富的民族志資料為基礎，具體分析二十世紀80年代以來國家實施的「草畜承包」制度給當地帶來的不利影響。

為了取代傳統「粗放型」的生產方式以及避免「公有地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的出現，各級官員、科學家以及國際力量推動了「草畜承包」制度的實施，將草原劃分給每家每戶(建立網圍欄)，使當地牧民能夠理性地、集中地和更具經濟效益地利用草場。因此，原來蒙古族粗獷的時空體驗變得分割、精細和功利化。然而，這個制度的實施卻意想不到地帶來了當地物理景觀和社會景觀的巨大變遷，包括環境退化、放牧混亂、經濟分化、社會不公、勞動商品化、社區分裂、健康風險增加，以及自我認同的危機等。不難理解，威廉姆斯在分析當前制度存在的種種問題的同時，其實也是反駁了上述官方話語中「怪前朝」的說辭，他主張當前實施的制度對於環境退化負有不可推託的責任。

三 景觀象徵主義

在分析了多種力量對當地環境和社會現實的影響之後，在第八章中，威廉姆斯又將分析的焦點轉移到那什罕蘇木的蒙古族牧民身上，

以他們為主體，了解他們在現代化過程中的具體經歷和體驗。在這部分，威廉姆斯運用了「景觀象徵主義」(Landscape Symbolism) 的視角來解讀附着在同一景觀上的不同意義和聲音的爭辯。在他看來，「景觀」是一種體現着權力和衝突的社會建構物，是上下互動和較量的界面，是多種話語論辯的場所。因此，通過對不同景觀的解讀，我們能發現更多有價值的信息。作者是從草、沙和網圍欄這三種當前草原上非常典型的景觀來入手的。

與漢族的觀念不同，蒙古族心目中理想草場的標準不完全是又高又濃密的牧草，樹木、山坡甚至一定程度的沙地都被認為是理想牧場的重要條件。傳統的遊牧生活建立在多樣性景觀的基礎之上，牲畜需要的不是同一種優良牧草，而是採食生長在不同地形上的各種牧草，同時牠們還需要一定的濕度和遮蔭，以躲避風和陽光的傷害。多樣性的景觀才能滿足牲畜全面的要求。因此，具有異質性而非同質性的草原對於牧民來說才是真正重要的。

在對待沙子的態度上，漢族和蒙古族也顯然不同。漢族將沙地視為無用之地，而威廉姆斯驚奇地發現，那什罕的蒙古族牧民比我們想像中要更容忍和喜歡沙子，他們認為帶有一些沙地的草原風景是非常美麗的。牧民將沙子分為「黃沙」和「白沙」，黃沙是「活沙」、「好沙子」，還能生長植物。作者還非常認真地列舉了(當地人眼中)沙子的經濟效用和象徵效用。沙地為牲畜提供了乾燥和衛生的棲息地，沙丘

與漢族的觀念不同，蒙古族心目中理想草場的標準不完全是又高又濃密的牧草，樹木、山坡甚至一定程度的沙地都被認為是理想牧場的重要條件。因此，具有異質性而非同質性的草原對於牧民來說才是真正重要的。

作者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即牧民穿越網圍欄時不會費事地去找進出的「門」，而是直接將鐵絲壓低然後跨過去。這個富有象徵意味的舉動表達的似乎是：網圍欄的建立並不能阻擋人們的流動性。

有重要的遮蔭作用，防止牲畜過度暴露在風和陽光之下。沙地的存在也保證了景觀的多樣性。更為弔詭的是，傳統的做法如往羊絨裏「摻沙子」也提高了牧民的經濟效益。

而在象徵效用方面，祖先選擇了這樣一塊有草有沙的土地來居住和放牧，遊牧的生活方式、沙草組合的環境以及棲居於該環境中的蒙古族牧民構成了一種有機整體。沙子的流動性和「自由」表達的正是對蒙古族傳統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紀念，同時也反襯出當地牧民在定居情況下的精神落寞和身份認同的迷茫，因此他們說：「我們愈定居，塵土〔沙子〕愈飛揚。」(頁190)在這裏，作者向我們指出，傳統宇宙觀其實還是以一種相當微妙的方式存在於當地牧民身上。

相對於草和沙而言，網圍欄是外來事物，但是它在當地環境中的存在和利用方式卻並非按照預先設計的那樣。草原上的圍欄經常被牲畜撞歪或撞倒，鐵絲也經常損壞或遺失。作者還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即牧民穿越網圍欄時不會費事地去找進出的「門」，而是直接將鐵絲壓低然後跨過去。這個富有象徵意味的舉動表達的似乎是：網圍欄的建立並不能阻擋人們的流動性。

除了草原上可見的網圍欄之外，在牧民的日常生活和心靈世界中，還有橫互在他們與主流人群之間隱形的，卻是密不透風的「網圍欄」。那些區分先進與落後、科學與愚昧、現代與傳統的話語，不正是起着將邊緣人群排除在外的阻隔作用嗎？但是作者認為，牧民並不是被動無為的，他們在言語和行動中

也表現出了自身的反抗——「破壞圍欄」；他們質疑科學技術的神話(例如認為飛機播種是無用的、浪費資源，認為人工授精只能產出病弱的牲畜)，執著於自身「落後」的生活方式；他們拒絕官方話語將他們定性為「替罪羊」，相反批評國家和市場力量對當地現實的強力干涉以及隨後的忽略，從而將他們置於不利的發展地位上。

威廉姆斯還列舉出更多的景觀可以用來做類似的解讀(如集體化時代的水庫、灌溉系統，戰爭年代的紀念碑等)，從中我們能夠讀出多個主體話語論辯的多元聲音，讀出當地蒙古族牧民身上不可忽視的主體性和抵抗，同時也讀出他們在現代場景下不得不面對的身份認同的內在緊張——蒙與漢、牧與農、公與私、流動與定居。接受作者訪問的一位牧民非常直接地描述出這種矛盾困境，他說發覺自己已經變成「非農非牧，非蒙非漢，非傳統也非現代」的奇怪人群中的一員了(頁175)。

四 結語

二十世紀80年代以來，「草畜承包」制度的實施給內蒙古牧區帶來了影響深遠的巨大變遷，即威廉姆斯說的「四個取代」：「管轄的空間取代了寬廣的地平線，同質化的地塊取代了異質的地域，資源的集中使用取代了景觀的多樣性，清晰的界限取代了沙與草的隨意組合。」(頁203)在這裏，我們看到的是一幅用資本主義經濟理性和科技手段

來改造傳統草原的圖景。然而，這種改造是現代性話語宣揚的所謂現代對於傳統、先進對於落後、科學對於愚昧的合理取代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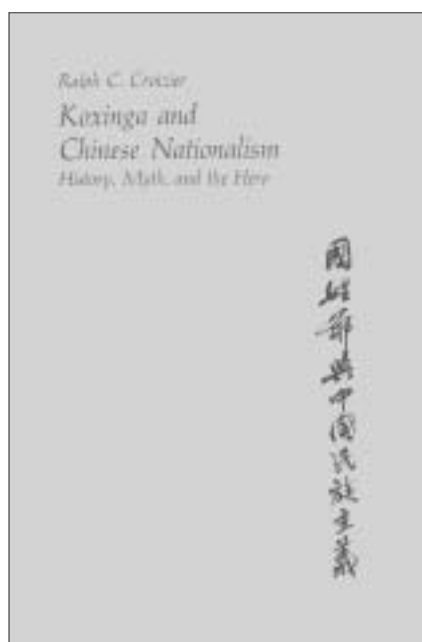
通過豐富細緻的民族志資料和鞭辟入裏的理論分析，威廉姆斯的《長城之外》揭示出內蒙古牧區環境和社會變遷過程中複雜而多重的、充滿權力衝突的現實：一方面，地方、國家和全球層面的多種力量結合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方式對當地產生着強大的影響；另一方面，當地的蒙古族牧民也仍在一定程度上堅持着自身的文化認同，抵抗外來

的壓力，在官方話語之外發出了不和諧的聲音。正如作者所說，「發展和科學話語將國家權力施加於邊緣人群身上，同時掩蓋這一點。而邊緣人群卻具有他們自己關於環境的相當不同的概念、認同和知識。」（頁10）到這裏，圍繞着草原沙漠化問題的政治魔術已被徹底地戳穿，而話語的面紗也得以完全揭開。我們也許可以說，改革開放以來「一廂情願」的草原改造的失敗，就是因為當地牧民傳統的生活方式、空間感和地方知識沒有得到充分的尊重和重視。

《長城之外》揭示出內蒙古牧區環境和社會變遷過程中複雜而多重的、充滿權力衝突的現實。改革開放以來「一廂情願」的草原改造的失敗，就是因為當地牧民傳統的生活方式、空間感和地方知識沒有得到充分的尊重和重視。

多面的民族英雄

● 范 瑞



Ralph C. Croizier, *Koxinga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History, Myth, and the Hero* (Cambridge, Mass.: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1977).

近年來，隨着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特別是象徵人類學）的不斷交融，漢語史學界開始關注歷史記憶、象徵符號與民族主義的互動關係，尤其是對民族英雄形象塑造的研究，取得了不少突破性的成果，為我們研究近代中國民族主義提供了導